



复旦博学论丛 第一辑

FUDAN BOXUE LUNCONG

回归真实的存在

——王船山哲学的阐释

■ 陈 贇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博学论丛 第一辑

FUDAN BOXUE LUNCONG

回归真实的存在

——王船山哲学的阐释

■ 陈 赞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陈赞著. —2 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 (2007. 3)
ISBN 978-7-309-03309-0

I. 回… II. 陈… III. 王夫之(1619~1692)-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9.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1336 号

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

陈 赞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士强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9

字 数 426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3309-0/B · 182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 容 提 要 …

王船山是明清之际最具理论深度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围绕关于真实存在的探索，本书对船山哲学作了颇为独到的诠释。作者从古典哲学的历史衍化以及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入手，考察了船山哲学所实现的视域转换；由此，进一步从天道、人道等方面，探讨了船山对中国哲学所作的理论推进。对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问题，如有无与隐显的差异、谓之与之谓之辨、理一分殊与万法归一所代表的不同趋向、同天法道与继天继道所展现的天人关系的不同类型、船山哲学中的时间性与世界性问题，等等，作了颇具新意且有一定深度的论述。同时，本书还对中国哲学中的诸多问题，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与分析。全书资料翔实，不囿陈说，在史料引证、理论阐释等方面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复旦博学论丛”编印缘起

作为一流名校的出版机构，我们始终奉行打造精品的一贯理念，坚持弘扬学术的不懈追求。“复旦博学论丛”的推出，就是在认真回顾、不断总结我们已有实践的基础上，力图进一步完善这种理念和追求的尝试和探索之一。

任何一部真正有质量、有价值、有层次的学术著作，也许因为其涉及领域的专深而需求有限，但就构筑学术研究的丰碑大厦而言，则一定是不可或缺的砖石；也许永远不会像一般畅销读物那样普及风行，但从学术研究的历史发展视角着眼，却应该具有更加长久的存在价值；也许由于不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不符合出版产业的市场要求，但终将以其对学术的特殊贡献而成就出版文化的永恒功德。我们理解学术研究的艰辛，因而不忍辜负为之矻矻奋斗的作者；我们虽知学术出版的代价，但是决不推诿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为此，在进一步努力开拓、做好一系列更新品牌、更高质量的学术选题的前提之下，另从历年已经出版的各类相关著作中复加精选，集成“复旦博学论丛”，以全部统一的版式装帧、若干必需的内容校订和尽量考究的工艺制作，

分辑再版重印。它们中既有先后分获诸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高校优秀学术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各类学术、图书奖项,为学界肯定认可者;也有因初印数量不多,而售罄之后又有良好反映评价和陆续不断需求者;还有作者虽然已经不幸辞世,我们欲重印其开创立说、流风及今的代表力作以感念其献身学术、支持出版之高谊者。总之,它们既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坚持,与几代学者风雨同舟、甘苦共享的合作见证,也是我们多年之中脚踏实地,和全体同仁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部分积累。

值此“复旦博学论丛”问世之际,我们还要借此机会,再次衷心感谢所有一贯信任、支持我们工作的全部作者,同时衷心感谢众多关注、鼓励我们事业的广大读者,并且也衷心感谢长年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的社内同仁——没有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

为了我们坚信的理念,为了我们坚持的追求,为了我们坚守的职责,我们希望尽力做得更多更好;因此也期盼来自各方的批评指教。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18日

序

杨国荣

自休谟以来,以存在为沉思对象的形而上学往往一再受到各种形式的诘难;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后,形而上学在哲学领域似乎容身更难。这种状况也影响到哲学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视域,形而上学的考察道路,常常显得较为边缘化。然而,哲学按其本来意义无法回避形而上学。黑格尔曾指出:“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而内容就是整个存在。”撇开其对存在的思辨规定,这里已注意到了哲学与整个存在之间的联系。“整个存在”不同于经验对象的具体规定,而是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中国哲学所谓“性与天道”,便涉及这一意义上的存在。以“整个存在”为内容,同时也意味着哲学难以将形而上学从自身中加以剔除。

人们往往根据特定知识形态(包括科学)与经验对象的切近联系,强调其具体性,这种看法当然不无所见。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特定的知识形态(包括科学)常常主要把握存在的某一领域,或主要从某一侧面、某一层面把握存在,而撇开了存在的其他领域或对象的其他规定。物理学研究的主要是存在的物理属性,生物学研究的是有生命的存在,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经济活动,如此等等。就其悬置了存在的其他领域及存

在的其他规定,仅仅指向存在的某一领域或存在的某种规定而言,特定的知识形态似乎又呈现抽象的特点。

知识的抽象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存在的抽象化,而存在的抽象化则往往导向对存在的分离。在分门别类的知识形态下,存在往往被相应地区分为不同的领域,知识的界限则同时也构成了存在的界限。对存在的如上把握方式无疑有助于深入地理解界域内的各个方面或层面,但它同时也容易偏离作为整体的真实存在。

相对于特定的知识形态,以“整个存在”为考察对象的形而上学更多地具有超越不同存在界限的特点。与特定知识形态(包括科学)致力于分别地把握存在的各个侧面或层面有所不同,形而上学试图提供的,是关于存在的整个图景。当形而上学越出存在的特定领域和界限,从总体上对存在的特征加以说明时,它同时也表现出如下的趋向:即扬弃存在的分裂,回归存在的具体形态。事实上,为特定的知识形态(包括经验科学)所分离的存在,只有在指向整个存在的形而上学中,才可能以统一的形态呈现出来;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以经验领域为对象的科学知识是抽象的,而形而上学则是具体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同于作为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在抽象思辨的形态下,形而上学往往远离形下之域及人的知行过程,或者以还原的形式追求万物之始基,并将这种始基视为“宇宙之砖”;或者赋予“理念”、“大全”、“绝对”等超验的存在以最真实的形态,并在这一类超验的存在之上提供世界的统一图景。这种形而上学固然不限于存在的某一领域或某一规定,但就其追求超验的、静态的存在而言,本身又陷于对存在的另一种抽象的理解。与之相对,旨在达到存在具体形态的形而上学,

则内在于人的知行过程,并以形上之域与形下之域的不断沟通为其特点。以中国哲学而言,通过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传统的形上学展示了对整个存在的关切,但同时,中国哲学又一再肯定日用即道,与之相联系的,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用不二等观念。日用即道意味着形上之道与日常的生活世界并非彼此相分,“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求在日用常行中达到超越之境,体用不二则强调了实体与其功能及属性、本体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不可分离性。

可以看到,扬弃存在的分裂、把握存在的真实形态,需要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本身又有抽象与具体之分。在如何走向具体的形上学、回归存在的真实形态等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曾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凝结了丰富的智慧;具体地反思这些认识成果,显然将深化对“整个存在”的理解和把握。

以中国哲学为视域,便不能不对王夫之的哲学予以认真的关注。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镇,王夫之对性与天道的考察具有总结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他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哲学史上很少有人企及,其所作的形上沉思则至今仍吸引着我们不断向其反顾。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当陈贇同志提出以王夫之的形上学思想为博士论文的论题时,我甚为赞赏;当然,我也提醒他,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经过苦思深研,以《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为题的博士论文如期完成;在评审及答辩过程中,有关专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作为导师,我对此感到欣慰。

围绕王夫之关于真实存在的探索,《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一书在形上学的层面对王夫之的哲学作了颇为独到的分析。作者从传统形上学的衍化以及王夫之对传统形

上学的批判等方面,考察了王夫之在形上学问题上所实现的视域转换;由此,进一步从天道、人道(包括个体存在与历史过程),以及两者的统一等维度上,较为具体地探讨了王夫之对中国哲学所作的理论推进。作者对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问题,如隐显、谓之与之谓之辩、理一分殊与万法归一所代表的不同趋向、王夫之哲学中的时间性问题,等等,作了较有新意且有一定深度的论述。全书资料翔实,不囿陈说,在史料引证、理论阐释等方面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在形而上学备受冷落的背景下,从形上的层面对传统哲学所作的这种思与辩,无疑具有独特的意义;它的出版,相信对于王夫之哲学及传统形上学的研究,都具有积极作用。

作为研究的对象,王夫之的哲学无疑具有历史的品格,但对其加以解读和研究,又离不开一定的哲学“先见”,这样,从研究方式的角度看,自然就涉及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广而言之,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所立之说,往往既是历史中的存在,又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首先是哲学,尔后才是哲学史,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那些流传下来的文本(包括王夫之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当时那些创新理论的载体。正由于哲学史上的这些学说、体系本身是当时的哲学家的原创理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哲学见解,因而当我们将这些理论加以研究时,便不能不对相关的哲学理论本身有一比较深入的理解。换言之,哲学史的疏理,离不开对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截然地划界或分家。事实上,对同一种学说、同一个文本,不同的哲学家常常会有不同的理解,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不同的解释者自身的理论背景、他们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各有不同:作为解释背景的理论

层面的不同,往往导致了对同一文本理解上的差异。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事实上也是从他们所达到、所理解的理论出发,对以往的文本作出他们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看,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同时也是对哲学的研究,哲学史的研究不应和哲学的研究完全分离。

哲学与哲学史的联系,当然不仅仅在于历史上的哲学在当时也是一种原创性的理论系统,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它还涉及历史的回溯与理论建构的关系。哲学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就史论史或为历史而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不应该仅仅满足某些历史的兴趣;在更深的层面,它同时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构和哲学沉思相联系。从哲学史上看,每一个时代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总是在回顾、总结以往哲学家的思维成果之后,进而提出他们自己的系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的考释之上;同样,今天的哲学史研究,也面临着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而哲学史的研究,则应该为这种理论的发展提供思想的资源。

谈到创造性的哲学沉思,就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任何一种新哲学的形成,都要以以往的哲学成果作为它的基础,哲学的理论建构不能从无开始,认为以往的哲学工作都是错误的,要求一切从头开始或另起炉灶的观点,是一种非历史的看法。在“哲学”这一范畴下工作,就不能不尊重哲学的历史,如果有人宣称要建构一种与历史上的哲学完全不同的系统,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所做的到底是不是哲学的工作。历史地看,在中国哲学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新的理论的建构往往是以注释以往哲学经典的方式而展开的,同样,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其哲学也是基于对以往哲

学的总结。当代一些原创性非常强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对哲学的历史,包括古希腊哲学(包括前苏格拉底哲学)、近代哲学如康德、尼采等也有非常独到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在他们那里,哲学的原创性与哲学的历史并非彼此悬隔。总之,哲学的理论创造不能脱离哲学史来谈,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哲学史的研究。

一方面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哲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哲学史的研究,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理论的循环。不过,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它所体现的,实际上是哲学和哲学史之间的一种积极的互动过程。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对哲学史与哲学可以有所侧重,但有所侧重不能理解为截然划界。哲学研究既应当避免没有历史的哲学,也应该避免没有哲学的历史。

从上述前提反观《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一书,则不难看到其在研究方法上的可注意之处。作者以史料的爬梳、疏证为基础,但又不停留于就事论事的罗列,而是注重揭示其普遍的理论内涵,力图体现实证考察和哲学分析的统一,从而使全书既呈现历史的视域,亦不乏理论的意蕴。

当然,所见与所蔽往往联系在一起。作者在试图融哲学立场于研究过程的同时,有时不免表现出某种解释过度的趋向;某些提法、判定,亦尚有可议之处。另外,在概念的清晰性、表述的流畅性,以及如何将哲学的思辨与严密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等方面,也有待进一步下工夫。不过,尽管还存在诸种不足,但作为年轻学子的研究成果,本书无疑展示了良好的开端。

本书摘要

船山认为,“尽天地只是个诚,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诚”不仅仅是德性意义上的真诚、诚实,更为主要的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终极范畴——“实有”,也即真实的存在。回归真实的存在构成了王夫之哲学的根本问题。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1) 从有无到隐显——哲学视域的转换:引出问题并揭示船山对传统哲学进行的范式转换。(2) 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从天道、人道以及两者的关系三个方面,回答什么是真实的存在。(3) 回归真实的存在:从个体知行活动与历史过程两个层面,探讨真实的存在如何可能。

本文对于船山哲学的诠释基于如下的看法:对于真实存在的探究,只有在隐显(或者幽明)的范式而不是有无的范式中才能获得批判的识度,而只有以批判的识度为基础,才能摆脱由于虚假的存在观念的奴役所导致的“观念的灾害”,才能保证所谈存在的真实性。有无的思想范式,总是把存在之思导向寻求世界最终根据的形而上学态度,而隐显的视域则把我们引向世界本身,导向人的知行活动过程。而从有无到隐显的范式转换,构成了船山哲学的根本出发点,这一转换具有解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意义。对于船山而言,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隐显之间的沟通如何可能的问题,而隐显之间的沟通就是生活世

界的内在本性。回归真实存在,不是回归形而上学的绝对本源,而是回归具体的生活世界,也就是在当下的生活实践中自觉地“通幽明之故”。正是在隐显的视野中,通过对“之谓”与“谓之”的辨析,王夫之表明,形而上与形而下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不是外部世界固有区域的客观分化,而是主体的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形而上是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它的特点是由显入隐,从可见通向不可见;形而下则是以感性实践的方式由隐到显,把不可见者带到当前。

什么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在天道观上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理气之辨、体用之辨以及理一与分殊的关系。

气的概念在王船山那里具有中心的意义,气具有“一物两体”的特征,也即它的显现总是有阴(隐)的一面,这就是它的自在性的根源;同时它的显现总有阳(显)的一面,气的这种特征就是存在展开为隐显之间交互作用的根源。气的概念意味着主体知能的界限,通过它才可以真正获得天道概念得以立身的基础;它证成了真实存在的非人为构造性质。王船山把理确定为气化运行过程中显现的条理、秩序,这样,与运行或实践相关的理,就不能在狭义的认识中给出。理负责的是运行的有效性,而不是知识上的可理解性。对于理的这种理解,避免了人为构造的“先设之定理”。理气的非人为构造性是从消极方面讲真实存在的自在自为性;从积极方面说存在的自在自为性,就是它的能动性、活力性。王船山把气、理的功能分别理解为生物(始物)、成物(终物),气负责创造,理负责成就,以气为理的基础,就保证了真实存在的能动性。

王船山改变了传统哲学中“贵体贱用”的形而上学体用论范式,而代之以“相与为体”的交互体用论模式,并把体用放置在隐

显的视野中加以理解,提出了“由用以得体”的言道方式。

船山区分了理一分殊与万法归一,万法归一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它把事物还原为某种绝对的本体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框架中,个体性不能真正加以建立;不是万法的自主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沟通,而是万法对于“一”的绝对依赖性,构成了它的理论特征。理一分殊要求的则是个体的自主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承认与沟通,它把个体性作为首要的关注,并把普遍性视为事物各各自正性命(也即个体性生成)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秩序。

从天人关系的层面看,真实的存在表现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通常所说的“天人之际”的“际”是一个“辩证的字眼”(黑格尔语),它包含着两个相反相成的含义:分化与交会。主体化天之天为人之天的实践,导致了天道与人道的分化,正是从天道中独立出来,才使人道获得了自由。自由主体的存在依据不再是天道,而是人道,因此,主体回应天道的方式是对之的承继,而不是与之同一。换言之,是继道、继天,而不是同天、法道,才构成了自为着的主体的存在根据。另一方面,主体正是在对于天道的承继与推进中,在对于天人之间“存有的连续性”的维护中,才将自身提升到人性的水平。

从人道的层面来看,真实的存在首先具有时间性的特征。世界的始与终对应着人性的生与成,世界的开端与终结都发生在现在,因为它只有通过主体的时间性才能得到恰当の説明,世界的发生过程也就是主体在自身当下的在世活动中揭示存在本身的过程。人是具有时间意识的存在者,他能够把不可见的过去与未来经验为现在意识的构成部分。时间就是存在的展开,存在展开为时间。对于人来说,时间意味着关系的承担,也即在

当前对于与不可见之间的关系的承担。从时间的视角来看,生包括生理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个体的在世过程以及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世代生成。以时间的方式对待生死,就是在当前承担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推陈致新。

从人道的角度看,真实存在还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理性并不与欲求相对,它的原初的功能在于燮理、利导,使欲求各得其所,各遂其欲。但是理性的功能不是对于欲求的“治疗”,欲求不是人的疾病。治疗与去欲的观念体现了一种衰弱、没有生命力的时代意识。“天理人欲只争公私诚伪”,天理的规定首先是以主体之间相互的承认与沟通为基础的公共性,其次是个体层面上的真诚无伪性,后者以自谦的感受为特征。感性存在并非仅仅是人的生物学特征或人类学规定,它还是人之为本体论规定。理性的开显只有在感性的彻底实现中才得以可能,而去欲的实践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理性。

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在王船山那里,这一问题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从个体性的角度来说,如何在知行过程中走向真实的存在;从类主体的角度,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回归真实的存在。

在广义的知行过程中回归真实的存在,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层面来讨论:(1)知行之辨,它承担主体与自身存在的关系。真实存在的把握不可能在抽象的“离行之知”中给出,只有在实践着的主体那里才能呈露。所以,实践优先性乃是船山知行之辨的必然要求。实践优先性原则包括两个层面:实践对于认识的优先性以及自身就是目的、就是内在心性的自然外化的诚明活动,相对于自身不是目的的知行活动的优先性。而从知行活动到诚明过程的转化,就是主体与他自身的存在沟通的过程。

(2) 能所之辨,它承担的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无论是知行活动,还是诚明过程,都不能仅仅限制在内在经验与心性涵养中,而是把外在的客体纳入到自身的发展之中,只有这样,主体才能成为文化的主体。(3) 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主体之间为争取相互承认与理解的斗争与合作过程中,而不是在单子式主体的“自证自明”的内在心性经验中,真实存在才得以显现。

在历史实践中把握和展现存在的思路,不同于宋明时代盛行的内在心性之学,历史的存在形式在王船山那里被表述为“天”,它既意味着一种自发性的秩序,又意味着一种“大视域”。对于“天”的不同规定,对应着走向历史性生存的不同方式。“天”以“人之同然性”为其具体含义,因此,参与历史性的生存,就是要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参与共同体的发展,自觉地承担与共同体的关系。“天”的另一含义是“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这一点意味着,把共同体的过去与未来接纳到当下的生存中,自觉地参与民族精神的生成。“天”还意味着“理性的机巧”,主体对于历史过程不可能拥有一种清晰、透明的意识。因此,走向真实存在,需要一种在不透明处境下的“技艺”,这就是“知几”、“知时”的实践性智慧。